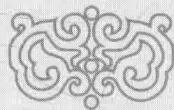




# 东汉晚期士人活动与文学批评

宋亚莉 ◎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东汉晚期士人活动与文学批评

宋亚莉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汉晚期士人活动与文学批评 / 宋亚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2

ISBN 978 - 7 - 5161 - 9903 - 9

I. ①东… II. ①宋… III. ①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 - 文学批评史 - 东汉时代 IV. ①I206.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4528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李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70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项目批准号：14YJC751034

# 目 录

导论 ..... (1)

## 上编 东汉晚期士人活动与审美风俗

第一章 东汉晚期党人活动与风尚变染 .....	(12)
第一节 结党、清议（谈）之风与党锢 .....	(12)
第二节 党锢与独行、放诞之风 .....	(24)
第三节 党锢与慕士、尚名、崇义之风 .....	(30)
第四节 私谥、会葬之风 .....	(36)
第二章 东汉晚期士人活动中的人物品鉴与文艺审美 .....	(40)
第一节 从名士识鉴实例看人物批评特色和方法 .....	(41)
第二节 士人政治、军事等活动中的人物品鉴 .....	(52)
第三节 东汉晚期士人的艺术审美 .....	(61)
第三章 东汉晚期风气转折中的皇权、士人活动与鸿都门学 .....	(76)
第一节 鸿都门和太学 .....	(76)
第二节 鸿都门学与皇权、士人及社会风气 .....	(81)
第三节 风气转折中的鸿都门士活动 .....	(91)
第四章 《风俗通义》与东汉晚期审美批评 .....	(97)
第一节 应劭及其家世 .....	(97)
第二节 《风俗通义》中的风俗视野与批评精神 .....	(99)
第三节 《风俗通义》中的风俗批评与审美批评 .....	(106)

---

<b>第五章 蔡邕的政治、交游、创作与文艺批评</b>	(113)
第一节 蔡邕的政治活动与政治审美思想	(113)
第二节 蔡邕的交游与文学批评	(122)
第三节 蔡邕的创作与文艺思想	(132)

## 下编 东汉晚期士人活动与建安文学批评高潮

<b>第六章 孔融与建安文学批评的形成</b>	(146)
第一节 孔融人物批评与审美艺术特色	(146)
第二节 孔融之“气”	(150)
第三节 孔融交友、诗歌创作活动中的“情”	(153)
第四节 孔融与建安文论的构建及对后世影响	(156)
<b>第七章 蔡琰的文艺审美思想</b>	(162)
第一节 蔡琰作品真伪的讨论及艺术风格	(162)
第二节 蔡琰诗歌的文本细读	(166)
<b>第八章 《昌言》与《中论》中的人文精神及风俗批评</b>	(174)
第一节 《昌言》与《中论》中的风俗批评	(175)
第二节 《昌言》与《中论》中士的审美精神	(179)
第三节 《中论》中的美育思想	(186)
<b>第九章 从曹操与士人交往活动看建安文学批评的形成</b>	(190)
第一节 曹操与汉末士人的关系	(190)
第二节 曹操与建安文士的离合	(196)
第三节 曹操对建安文学批评的贡献	(199)
<b>第十章 士人流动及非曹魏集团的文学批评</b>	(205)
第一节 各集团士人分布、流动及与党锢名士的关系	(206)
第二节 士燮交州集团的文学批评发展	(211)
第三节 刘表与荆州的文学批评发展	(214)
<b>第十一章 二曹与建安文士的文论对话及建安文学批评高潮</b>	(220)
第一节 二曹与吴质的文论对话	(220)
第二节 曹植与杨修的文论对话等	(226)
第三节 《典论·论文》等与建安文学批评的高潮	(230)

---

第四节 建安歌诗中“清”、“悲”、“慷慨”等审美范畴 .....	(235)
结语 .....	(250)
参考文献 .....	(253)
后记 .....	(255)

# 导 论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东汉晚期（桓灵时期）至建安时期的文学批评的环节，历来语焉不详，留下许多空白。而这一段历史，不仅不应当成为研究的空缺，而且对于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乃至艺术批评，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段中间环节的研究，虽然头绪繁多，不易梳理，易为学界所遗弃，但实际上却是深入探索前后发展因果关系的重要环节。因此，对于东汉晚期士人活动与文学批评关系的研究，就不仅是拾遗补阙，而且是探明前后演变的重要研究。基于此，本书以东汉晚期士人活动与文学批评作为研究课题，旨在洞察自东汉晚期至魏晋文学批评因革的奥秘。

东汉文艺批评与审美研究，历来研究者不多，现有的文学批评专著大都简略提及。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东汉文学批评，仅有一节“王充之文学观”。认为王充之文学观，出于班彪而主善，出于桓谭而主真。就文论，以能造论著说者为高，以鸿儒为超，以真善为美。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谈及东汉文学批评，涉及作家仅有班固、王逸、王充。罗根泽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也谈王充的文学批评。就“尚文与尚用”、“作与述”、“实诚与虚妄”、“言文一致与文无古今”等展开讨论。蔡钟翔等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中东汉文论同样仅谈王充文学思想。朱东润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谈及“东汉之文学批评”，增加桓谭，言“东汉一代，文学论者，首推桓谭、班固，其后则有王充”。之后的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或将秦汉合并一章，或两汉合并一章，讨论范围不外乎上述内容，对东汉的文艺批评皆鲜有系统完整的论述。探其缘由，盖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史而言，东汉既尚无可足称道的系统著作，也无思想泽溉深远之大家，似乎是一个文艺批评暗沉的时代。

当下对东汉的文艺批评关注不够，源于对东汉文论在中国文艺批评史的地位认识不足所致。东汉在古代文艺批评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前有孔孟老庄，确立了中国文论的基本范畴，之后中国文学进入“自觉时代”，涌现出文论的集大成著作《文心雕龙》等。作为转折时期，东汉尤其是东汉晚期，诸多政治、文化运动同时发展，时代的迅速迭变，儒士卷入其中，未有足够的时间沉淀，但在诸多方面却蕴含了具有文艺审美的思想和思潮，泽溉了后代。东汉晚期桓帝、灵帝时，王室大坏，九州幅裂，乱靡有定，生民无几，士人由五经谈论转而品评政治，后形成太学的清议风气，成为强大的政治舆论。郭泰等名士的人物品藻以及李膺、陈蕃等官僚的相互援引，与之后的两次党锢之祸密切相关，东汉晚期的人文思潮在其中得以兴起，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但究竟具体如何从经学而清议，士人社会活动与人物品鉴有何联系，党锢之祸反映了东汉晚期怎样的思潮以及是如何反映的，其中的思想如何泽溉后代魏晋的审美思想，较少有研究者讨论。以士人活动为思考点，结合正史，考察蕴含的文学思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书尝试从东汉晚期切入，研究桓灵时期至建安时期的士人活动与文学批评，旨在洞察自东汉晚期至魏晋文学批评因革的奥秘。魏晋文学批评源于东汉晚期人物品藻，人物品藻则是在东汉晚期政治活动中得以形成，以活动入手研究文学批评，能够突破以往传统从观点到观点的研究方法。还可对东汉晚期政权结构与曹魏集团、袁绍集团等官僚构成进行爬梳，从而对儒学与政权意识形态、士人活动与曹魏等集团的文学批评加以厘清。

正文之前，有必要对全文的一些概念加以说明。首先是本书所谓“东汉晚期”的界定。东汉一朝，自光武帝刘秀建武五年（25）至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共195年。论题中的“东汉晚期”，理论上指的是自汉桓帝即位（146）始，至汉献帝延康元年（220）止，在实际研究中，由于相关作家的卒年及其影响、相关文学现象的影响涉及魏初，故而这段时期则因研究的需要而加以必要的前推和后延。

这种界定，基于如下考虑：其一，以往中古文学理论以魏晋六朝为正宗，对东汉关注较少。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讨论的重点也在东汉前期，集中在桓谭、王充和班固等的文学批评观和审美研究，对东汉后期的作家、作品和关涉文学理论的文学现象的关注远远不够；其二，东汉晚期的

文学批评，尤其是士人活动与文学审美，是魏晋之后诸多文学理论命题的源流，对于自东汉晚期风云变幻时代与各种政治和文化势力造成的文学思潮变化，学术界的关注远远不够，由于学科的人为割断，这一段的士人活动与思想文化的互动，往往委诸思想史研究领域，而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则很少介入，从而制约了研究的深度，使汉代向魏晋文学批评的演进缺少内在原因的说明。因此，关注东汉晚期这一段士人活动与文学批评内在关系的梳理与探讨，在通贯汉魏六朝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前提下，将其独立出来而加以研究，有助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向前推进，也是此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学术研究的增长点之一。

对本书所谓“文学批评”的说明和研究方法的说明。在未有系统性古典文学批评论著如《文心雕龙》出现之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散见于各类典籍中。结合研究时间阶段的特点，本书将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士人活动的动态中把握和分析各个层面的文学批评。本书所讨论的文学批评包括以下内容：

1. 关涉文学理论、文学审美的士人的政治、文化活动。
2. 作家作品中的文学批评观念和审美观念。
3. 社会审美风俗和审美风尚。
4. 相关文学批评范畴。

本书力图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把握和分析各种关涉文学批评的现象，与袁济喜先生一贯提倡的文学批评理念、美学研究思路相一致。袁济喜先生在《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一文中指出：“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论属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是指古代中国的人们依据一定的哲学观与美学观，对于文学现象以及相关的自然、社会和精神现象所作的阐说，其中既有着深邃的理论，亦不乏印象式的随感。”“今天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这门学科与学问的认识和界定，也应当随着今日学术的交叉与互动而有所发展，既要从传统的文献学与个案研究出发，也要重视从文化与精神的层面去加以阐释，以使中国古代文论在解释与研究中生生不息，走向将来。”<sup>①</sup>从此思路出发，东汉后期作为魏晋文论的源头，必然在士人活动、作家作品、社会文化现象中蕴含着泽被后代的审美风尚、审美观念和批评观念。

<sup>①</sup> 袁济喜：《中国古代文论精神》，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本书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文史互证法。对相关问题的研究，首先建立在对大量史料的收集和梳理上，进而发掘其中蕴含的批评理念和审美倾向。既有对大量史料的考辨梳理，又有对关涉文学理论、文学审美现象的清理。文学批评层面的研究构筑在史学层面的考论、辨析、厘清之上。在具体研究中，使用承传统的文献与考据方法的同时，也吸纳与融会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的精华，最后，还将采用考证的方法、数据统计法以及对比论证等方法。

本书所言的“士”的范畴和士人活动的界定。本书所探讨的士，主要指东汉晚期三国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有所关联的儒士，他们或承教于名师，或具有世家传承的家学基础，有其礼乐诗书的修养和追求。

需要说明的是，有名士味的割据军阀统治者不少也是“士”，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谈道：“黄巾乱后，继之以魏、蜀、吴三国，曹操、刘备、孙权皆士也。”<sup>①</sup> 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但是在具体的讨论中，本书更加强调在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中动态地考虑其身份的复杂性。如曹操早年出身宦官，又与党锢士人交往密切，后成为割据政权的统治者，其身份和思想几经新变。再如汝南袁氏，汝南袁氏在士林中威望极高，有“四世三公”之声誉。其四代位居三司司徒、司空、太尉者共有五人，又有“四世五公”之美称。东汉晚期的袁绍出身高贵，又能礼贤下士，在诛灭宦官集团的最后斗争中功绩卓越，更因其叔父袁隗被董卓灭族，士林各界痛惜德高望重的袁老太尉，各地贤士纷纷投奔袁绍。袁绍的身份更倾向于清流官僚，或者割据政权的统治者。诸如刘表之类，则是典型的士阶层之成员。刘表的身份首先是东汉晚期名士，是荆州士林文化的领袖，其次才是荆州的军阀。东汉晚期党锢之祸，刘表是宦官集团搜捕的党人之一，《后汉书·刘表传》载“（表）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诏书捕案党人，表亡走得免”。正因为如此，刘表从骨子里亲近天下士人，在他治理荆州的二十多年里，接受了大批避难的士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荆州可以称得上当时全国的士林中心。

界定是不是本书讨论的“士”，要从根本上看其是不是符合以下士的

<sup>①</sup>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新论·中国智识分子》，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64页，以下《钱宾四先生全集》引文皆出自此版本。

特点：具有一定的人生信仰与道德追求，师出有门、有其诗书礼乐的文化渊源、在士林有一定的威望、最能体现士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故而，东汉晚期的蔡邕、应劭、郑玄、孔融等人，名士范滂、张俭等人，魏初的仲长统、王粲、缪袭等人，都在本书的“士”讨论之列。同时，诸如曹丕、曹植与这些文士有书信往来中关于文学批评、文学审美的讨论，也归属到“士”的活动范围内进行讨论。本书所谓的“士”在社会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特点。

1. 士与朝廷清流官僚关系密切，两者在舆论上互相支持，在政治上相互帮助。东汉晚期三国的士阶层，无论如何清高尚谈，他们都不可能和官府划清界限，士林实际上就是朝廷清流官员的后备军，不少名士通过荐举的方式入仕，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一位儒士的理想，而实现理想，“奉时以骋绩”，入仕是不二选择。

2. 东汉名士，重视社会交际、朋辈名誉远胜于朝廷爵禄。他们有进入仕途发展的理想，然皇帝政权旁落，外戚、宦官把握朝廷的现实，使得他们更愿意选择通过“同志”者的引荐、品评而在士阶层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官职、爵禄所不能代替的荣耀，因而士阶层之间的亲缘、师生、同门、同乡等关系得以极大的凸显。

3. 名士和名士之后在士林威望极高，能极大影响和操控社会舆论的导向，其能力远在政府之上。名士的世袭，承袭的不是名利爵位，而是显赫声名威望。当时的风流名士不少家世显赫，如颍川荀彧是东汉名士荀淑的孙子；弘农杨修，其父是汉东清流官宦杨彪，祖上是“关西孔子”杨震，四世三公；颍川钟繇，祖父是名士钟皓，而颍川陈群的祖父则是东汉名流陈寔，山阳王粲的曾祖父王龚和祖父王畅都位列三公，等等。

4. 士开始精神贵族化、艺术化，有了特定的审美趣味，并能导引社会，从风义节操到言语举止皆成为一种美，他们在残酷的政治旋涡中绽放了自己的人生之美，为人所追慕。

东汉晚期是士发展史上最为绚烂多彩的篇章，他们重名尚节，以清流自许，蔑视权贵，他们有着高贵的疏离王权的尊严，钱穆先生说得极妙，“书生的潜势力，已在社会植根甚深，他们内心有一种自高位置，不同凡俗的直觉。他们成为书生贵族，不像战国时代平民学者之剑拔弩张，也不像西汉时代乡村学者之卑躬折节，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蔑视

政治权力，淡置一旁。那时是名胜于爵，政府的爵禄，敌不过社会的名望。君臣关系远逊于朋友”。<sup>①</sup> 桓灵之际至于建安时期的士阶层，独步千古，是士阶层最为绚烂之群体，为后代士所敬仰、追慕，是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批评的渊源，可谓“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这也正是本书所探讨的。

广义的士人活动应包括士人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军事活动、文学艺术活动、日常交友活动、游宴活动等。本书力图从东汉晚期士人活动中挖掘此时期文学批评、文学审美的发展脉络，故而在所有士人活动中，关涉此时期文学批评、文学审美的上述士人活动都在讨论之列。当然，军事活动中涉及较少。

本书所谓的“党”等概念。党在中国古代，始终带有贬义色彩。繁体的“黨”，从黑，尚声，有晦暗不明之意。《说文解字》载“党，不鮮也”，不鮮，不明亮，也是晦暗的意思，这是形容词的用法。党作名词时，是古代的户籍编制单位，《周礼·大司徒》载“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百家为一党，所以党又有为特定利益或目的而结成的群体。而作动词时，侧重于“偏袒、偏爱”之意。

本书所谓的党人，指东汉桓灵之际被宦官冠之以党人的东汉晚期名士和清流官僚。（这里分为名士和清流官僚两类，其实难以截然分开，不少人既是名士又是清流官僚，如李膺等，为了表述方便，姑且如此叙述。）《后汉书·党锢列传》载：“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东汉晚期的这两个群体与朝廷宦官集团有尖锐冲突，宦官利用皇帝年幼，巩固本集团之权势，排挤和压抑进而迫害名士和清流官僚。党锢，因被指为党人结党而遭受牵连、禁锢。遭受党锢者，封闭禁止的是入仕的权力，并牵连五族。东汉晚期，虽宦官诬陷清流官僚和名士，党人二字在社会舆论中却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诬陷为党人者不以为耻，反以为无上之荣耀，党人被逮捕逃亡，人们破家相容。皇甫规、朝野皆知他和党人无丝毫关系，却上书皇帝自言附党。东汉晚期党锢，使得名士和清流官僚（多数从士阶层而来）成为社会的精神领导者，书生的潜势力，经由党锢之祸，被最大能量地激发出来，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声望重于爵禄，朝廷

<sup>①</sup> 《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新论·中国智识分子》，第164页。

的爵禄，分量远不及社会的名望，君臣关系更比不上师友情谊，重情尚义，为之死尤嫌不足。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讨论中，名士、清流官僚、党人三者之间或有兼容，有部分人既是名士又是清流官僚还是党人，部分兼有三者之二。



# 上 编

---

东汉晚期士人活动与审美风俗

东汉晚期政治黑暗，经济衰败，昔日强盛繁荣的汉帝国犹如一艘慢慢朽烂的大船，虽然仍在行驶中，却渐走向沉没的不归之路。皇帝年幼，宦官、外戚擅权，桓灵二帝，卖官鬻爵以充盈国库。据《后汉书》载：

（桓帝永寿四年）秋七月，京师零。减公卿以下奉，贷王侯半租。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sup>①</sup>

（灵帝光和五年）是岁，鲜卑寇酒泉。京师马生人。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灵帝中平四年）是岁，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sup>②</sup>

桓帝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灵帝也卖关内侯、虎贲、羽林，更卖公卿爵位，卖官鬻爵，灵帝甚于桓帝，可知朝廷政治经济日益衰败。为了填补空虚的国库，公卿皆明码标价。这种情形之下，有钱之人买得高官爵位，当官之后更易中饱私囊，桓灵二帝此举，看似迅速直接地解决了朝廷的经济问题，充盈了国库，实则为亡国埋下了隐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如是，东汉帝国从公元147年桓帝即位到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仍然延续了73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分析了东汉晚期衰而不亡的原因：

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混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踵就戮，视死如归。夫岂特数子之贤哉，亦光武、明、章之遗化也！当是之时，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则汉氏之祚犹未可

<sup>①</sup>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7《孝桓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308—309页。以下《后汉书》引文皆出自此版本。

<sup>②</sup> 《后汉书》卷8《孝灵帝纪》，第355页。